

右衽中国微讲堂纪要(二)

王 俊¹, 赵 波², 左金欢³

(1. 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1620; 2. 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 服饰文化专项基金, 廊坊 065600;
3. 河北科技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石家庄 050018)

中图分类号: TS941.19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2095-4131-(2020)05-0110-05

Summary of "You Ren" Chinese Micro-lecture(2)

WANG Jun¹, ZHAO Bo², ZUO Jinhuan³

(1. School of Fashion and Art Design,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China;
2. Beijing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pecial Fund for Clothing Culture, Langfang 065600 China;
3.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右衽中国微讲堂自2020年4月18日至2020年8月29日进行了10次授课,由武汉纺织大学李斌副教授、中国服装博物馆馆长赵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廖江波副教授、上海纺织博物馆段玲高级工程师、东华大学副教授王俊、东华大学博士梁文倩分别对中国服装的起源、中国袍服史、中国传统麻葛织物、民国旗袍的面料、高级定制技术与时尚创意、《良友》画报与旗袍等问题进行精彩的授课,获得微信群内专家、学者、爱好者的一致好评。

1 中国服装起源的再研究(主讲人:李斌,时间:2020年4月18日)

李斌认为,服装起源常规研究路线主要包括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三条研究路线。然而,由于服装起源于人类进化之初,属于史前文明的范畴,距离现代时间比较久远,造成文献学资料观点相互矛盾,考古学研究文物缺失严重的状况。而人类学则是对现代“原始人”的语言、行为以及社会属性的考察后,所进行的一种对真正原始人生存状态的反推。因此,这三条研究路线都有各自研究困境。整体上看,文献学的研究路线显然是对古人对原始人着服装动机展开的研究,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也带有古人的辉格史观;考古学的研究路线由于文物严重缺失,无法对服装起源的上限和材质进行合理的解释;人类学研究路线同样具有以偏概全的先天缺陷。李斌认为,古汉字字源学和哲学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也许是正确解决服装起源问题的有效路线。

从古汉字字源上看,与服装相关的古汉字充分能证明服装的起源于携带工具,它是原始人类生存的一种有效手段。李斌认为,甲骨文巾(巾)和𠂔(带)就能说明服装的原始形制。事实上,前巾与后巾的作用最初可能并不是为了遮羞,而是便于工具的携带。众所周知,原始的工具

收稿日期:2020-09-21。

基金项目: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一般项目(20Y0001)。

作者简介:王俊,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赵波,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常务副主任;左金欢,河北科技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均是石、木、骨等材质制作,如果用腰带将其直接或间接系于腰间,原始人在奔跑时这些工具会击打到身体的脆弱部位(生殖器、臀部、大腿根部)。因此,前巾和后巾的出现就非常有必要,它们能起到保护身体免受携带工具的伤害。基于巾和带的甲骨文分析,李斌倾向于原始服装的形制为一条腰带加上前巾和后巾组成,甲骨文带字(𠄎)就是其形制。

李斌认为,之所将“衣”排到“食”之前,而是“衣”曾经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工具。首先,“衣”作为一种获取生存发展的工具,排在“食”后面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没有“衣”这种重要工具的存在,“食”的获取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其次,当人们解决了“食”的问题,继而解决安全的问题——“住”就理所应当了。最后,当安全问题解决之后,人类的拓展生存发展空间手段——“行”就突显出来。显然,李斌有关“衣食住行”排列顺序的解释完全符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和马克思“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理论。因此,从“衣食住行”的排序上看,服装必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生存工具。

基于古汉字源学和哲学两维的交叉分析,李斌赞同服装起源于携带工具的需要,其最初的形制应为皮质的腰带,随着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最终在不同的地区产生各具特色的成型服装。

2 中国袍服简史、先秦袍服研究、宋代服饰研究、明代服饰研究(主讲人:赵波,时间:2020年4月25日和5月24日、6月7日、7月18日、8月29日)

赵波作了四次讲授。中国袍服简史分两次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袍服进行图音并茂的讲授,他以一些实物进行简单的讲述。

第三次讲授,赵波以先秦袍服为对象进行详细解读。赵波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袍服出现并发展的一个时期,对于中国袍服研究的追根溯源有着关键的作用。袍在先秦时期其主要的功能是内衣,所以在穿袍的时候一般会在外面加上外衣。在战国的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帛画中墓主人穿的就是一件曲裾的深衣,衣身有卷曲的图纹,腰身非常的纤细,它的领子、袖口都有宽阔

的缘边,衣裾长可拽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秦时期的旗袍形象,所以在先秦时期袍服就已经开始作为贵族的常服出现了,并且已经有了纹饰和彩绣。赵波通过两件战国时期的造像和湖北的马山一号墓出土的袍服总结出先秦时期的袍服从功能上分为常服制袍和内衣制袍,这两种袍是男女都可以穿着的,贵族穿的袍基本上是趋于瘦长,非常的大,衣领基本上都比较宽,衣上面一般有织或绣的精美纹样,衣缘一般都比较宽,而且这些贵族所穿着的衣缘大多数都会选用厚质地的织锦进行装饰。此外,赵波也总结了以衣料命名的袍,先秦时期的袍也就是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这一时期的袍服有缟袍、缁袍、锦袍。另外,赵波总结到先秦时期是袍服发展的一个初期阶段,其形制基本可以概括为大袖式、宽袖式和窄袖式三种。后世袍服的袖型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型进行演变的。先秦时期的袍服功能相对于后世来说比较简单,它并没有作为朝服、大礼服这种形式来出现,它基本上作为贵族的燕居服和大多数人来穿的内衣的形式出现的,而且从传世的实物来看,帝王、贵族他们所穿着的袍会有精美的装饰,而普通百姓所穿着的服装是很少有装饰的,但是这时期的袍的种类非常多,只看史书上有明文记载的袍的种类就多达十余种。最后,赵波认为现代人要研究国服,先秦是一个源头,发掘其特点,更好地设计出代表个人、地区以及国家形象的礼服是它的社会价值;设计出蕴含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和风情,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一种方式是其文化价值;如何对袍服进行改良创新,使其既传统又国际,既古典又现代,既时尚又有内涵是它的艺术价值。因此对先秦时期袍服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是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三重价值的研究方向。

第四次讲授,赵波基于一些传世的绘画、文物、文献以及出土的文物中的袍服信息分别对宋代的男装、女装与童装进行了讲解。首先赵波基于《孝经图》《中兴四将图》《范仲淹像》《听琴图》《睢阳五老图》对宋代的男装进行了讲解。随后,赵波又讲到了女装,首先讲到的是宋代吴皇后受封时所穿着的服装,头戴九龙花钗冠,面部贴有

珠钿,耳上戴的是珠玉的耳坠,身上穿的是深青色的裱衣,衣上织有成对的锦鸡纹样,衣领、袖口、下摆的衣缘部分都是朱色的云龙纹,脚上穿的是如意云头的青舄。接着又讲到了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时期的《瑶台步月图》,图中三位女主人身穿窄袖对襟的褙子,而里面的上衣穿的是抹胸,下衣穿的是裙。根据此图中女性服饰的穿着方式赵波又分享了几件出土的宋代女装。最后赵波又讲到了童装。宋代儿童的服装基本上和成人所穿着的服装款式是类似的,大多数是把成人的服装缩小了。

第五次讲授,赵波分别从形制视觉、材料视觉、色彩视觉三方面对明代的袍服进行了分类研究。首先赵波先从形制视觉上对明代袍服进行了分类,将明代的袍服归纳为大袍、短褐袍、顺褶、对襟袍、衬褶袍、贴里、直身、道袍、盘领窄袖袍、盘领右衽袍十种。接着赵波又讲到了基于材料视觉的明代袍服分类,将明代袍服分为纱袍、绞丝袍、罗袍、绢袍、布袍、棉袍六种。随后他对这些袍服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3 中国传统麻葛织物(夏布)的几个相关问题(主讲:廖江波,时间:2020年5月9日)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廖江波的讲座,以中国传统麻葛织物为主题,围绕“天然纤维服用是先有丝还是先有麻?”“为什么现存中国传统麻葛织物稀少?”“什么是夏布?”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述。

(1)在中国是先有丝还是先有麻,这个问题我们单从中国出土的织物来看的话是很难去判断的,但是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麻织物的历史要比丝织物的历史更悠久一些。埃及的亚麻服装为最早的可成型的服饰之一,距今有5,400~6,000年的历史。中东以色列、埃及被认为麻纺文明的发祥地。以色列犹大沙漠发掘的麻织物残片,推测为麻类韧皮纤维,距今约有9,160~8,150的历史。另外,在棉、麻、丝、毛之前还有一种植物叫“葛”,它的纺织利用历史更悠久。从葛的形态来看有点像绳子的感觉,结绳是纺织早期的萌芽。因此认为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发祥地,但麻葛类韧皮纤维的纺织利用更早。

(2)中国传统麻葛织物存世的稀少,其与织物的本身特征和丧葬制度有关。一是传统麻葛类织物不饰文采、粗糙少有精品。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织物中丝绸织物和麻织物,我们看到的麻织物在质量上、精度上或者说在文物的价值上,完全没有同麻葛织物相提并论的资本。二是丧葬制度。粗糙的麻做孝服,丝为养生送死,事鬼神的神物。《礼记·礼运》:“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

(3)对于什么是夏布,廖江波认为:夏布是以苧麻为原材料,包含绩麻成线工艺织造出来的织物。夏布有全手工夏布、半手工夏布、机织夏布,采用剑杆织机来织夏布,就是经线用机织纱,纬线就用手工纱,这样可以保留夏布挺阔和古朴淳厚的质感。纺手工纱过程又称为绩麻,其以天然沤制麻缕首尾相接成麻纱,精细的麻纱是纺织优质夏布的基础,是夏布织造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核心。

4 民国旗袍的面料研究(主讲人:段玲,时间:2020.6.20)

段玲通过对旗袍实物的研究主要讲述了民国旗袍的面料的特征。她首先讲到旗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服饰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服饰的影响,蕴含着几百年来中国女性对美的追求与诠释,曾被誉为中国的“国服”。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满族入关前穿着宽松的长袍便于骑马打猎,这种长袍便是现代旗袍的雏形。而满族人入关后,生活开始逐渐汉化,旗袍装饰增多,在宫廷中广泛流行。辛亥革命后,西方服饰及面料涌入中国市场,旗袍融合改良了东西方服饰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是旗袍发展的顶峰时期,在这一阶段旗袍在面料、款式的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体现女性曲线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因此旗袍在当时非常流行并被女性普遍穿着,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旗袍的款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接着段玲又讲到服装的款式、面料共同体现了服装的整体风格,是旗袍中最直观、最易辨认、最能体现设计风格的元素。有很多关于民国旗袍服装的款式、剪裁的研究,但是对于旗袍的面料

的探讨却很少。而面料作为服装的基本材料,影响着旗袍的手感、质地和视觉艺术效果,不同的款式也要借助材料和图案来表达设计情感。海派旗袍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富有商业和民间色彩,旗袍面料呈现出了多品种、多花色的格局。

继而段玲又对上海纺织博物馆馆藏民国时期无袖旗袍实物面料进行研究,通过对面料的材质、组织结构、织造印染方式、颜色、纹样分析民国时期旗袍的特点。材质的鉴别主要通过红外光谱无损测试分析,借助体式显微镜和纺织CAD绘图分析花型纹样,采用记录、比较、统计和推理等方法展开实物分析和讨论,结合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得出关于民国时期旗袍面料使用的相应结论,以期对民国纺织品和服饰时尚研究有所贡献。

段玲认为以往鉴别材质的方法是用火烧或者挑纱出来放到显微镜下面去看,但是这样不可避免的都会对珍贵的旗袍样品造成损害,由于丝绸较为贵重,所以要尽量避免在鉴别过程中的损害。上海纺织博物馆纤维实验室傅里叶红外光谱测试仪器就是为这种珍贵的样品做无损鉴别的,只需要轻轻把样品放在载物台上,就可以进行分析测试了。

最后段玲讲到尽管博物馆对于旗袍的收藏是一种随机式收藏,但是通过对民国旗袍实物的面料的详细分析,可以得出关于民国时期某种海派旗袍面料的基本特征。她们馆藏的一件民国旗袍面料的纤维品种为桑蚕丝,说明丝织物是作为一种较为贵重的原料在夏季旗袍中所采用的。面料的组织结构以简单的平纹结合多臂织法,配以色织方法,让面料呈现丰富的花型与立体的视觉效果;而颜色的选择是适用于夏天的黑、白及淡黄色;纹样的选择了具有丰富寓意的石榴纹样,和传统石榴纹样相对比,有可能是受到了西方文化影响,所以石榴纹样造型有所改变。研究表明该件民国旗袍中的原料选择、织造方式、花型排列、装饰纹样,对现代服饰设计中有关装饰纹样的选取、纹样的结合以及色彩面积设计都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进一步为旗袍装饰纹样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真实价值和可借鉴性提供了参考。

5 从 CHANEL 的高级定制技术到时尚产品的创意发展:谈谈高定技艺对当下时装设计的启示(主讲人:王俊,时间:2020年7月4日)

王俊是从 CHANEL 的高级定制技术到时尚产品的创意发展中谈到了高定技艺对当下时装设计的启示。

他首先讲到了高级定制的概念,最早的高级定制是传承在法国的宫廷服装之后的,而时装的概念最早也是从法国宫廷服装中传递下来的,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时装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早期典型的高级定制就是“华托裙”,华托是一个画家,但他当时描写了大量的洛可可风格宫廷人物,通过“华托裙”的形状衬托出当时女性的优雅,虽然华托裙很美,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穿着不太舒适,这也是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终将是男性的附庸。

而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后,时装已经进入了社会当中,慢慢地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消费的对象,所以“华托裙”也就慢慢淡出了舞台。而在“华托裙”之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设计师叫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沃斯开创了第一间高级定制的定制屋,而定制屋更多的是为市场的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它慢慢形成了现代时装的基本雏形。而相对之前的宫廷服装已经有了自己的特点:第一是有市场;第二个是可以商业化的进行制造生产和销售;第三个是用了模特。

在沃斯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了整个时尚产业里面几个典型的人物,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加布里埃·香奈儿,她是法国很有名的设计师,对于整个时装业来说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是时尚的标杆。而与沃斯相比较,她又使高级时装行业向前跨了一大步,她设计最能充分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引导现代女性方向。由于香奈儿生于法国南部山区,有强烈的反贵族意识和为劳动妇女服务的思想,所以她的服装更多的是体现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变化。这里王俊讲到了一张身穿香奈儿服饰的女性,而图中的女性具有一种男性化的特质,无论是她的服饰、帽子还是她的肢体行为,很明显已经摆脱了社会上男性附庸的地位。

她以创新的运动装设计而闻名,使用针织衫或针织花呢等针织品。王俊讲到了一件香奈儿早期的既明显时尚又完全实用的服装,其中既有装饰性又有功能性的建筑元素。这样的柔软针织面料制成的连衣裙不需要太多的缝合来达到舒适的贴身效果,但这里的接缝也更加平坦,强调了设计的苗条垂直性。即使是编织的自制织物装饰,也可用作中央正面和袖口的纽扣环。

王俊又讲到香奈儿很多的设计并不是纯粹的装饰性设计,而是具有实用性的,比如她设计的脱卸式袖口就是考虑到了当时职业女性的工作需求,服装既需要简便同时又要低成本,所以她推出这种实用性的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由此可见她当时的每一个设计都是创新和突破。

而且她不断的通过一些创新设计提高面料的附加值,比如说饰边,包括面料里面自带穿插,这样能在有限的材料里面不断的进行突破,也带给了我们现代设计中的一些新的启发。她也并不是天马行空去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通过王俊对香奈儿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之所以香奈儿始终对高级定制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在款式上相比那些传统的高级定制服装来说是在不断的进行突破的,并且能够结合时代的需求抓住新的目标消费市场,同时能在有限的材料中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不断的创造惊喜。

6 基于《良友》画报中前期旗袍(1926~1929)款式和设计分析(主讲人:梁文倩,时间:2020年8月1日)

梁文倩统计《良友》画报旗袍的出现频率发现,1926~1927年旗袍的出现次数低于旗袍马甲、文明新装等服装样式,而1929年旗袍的出现频率并不升反降。就这一现象她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①1926~1927年由于孙传芳对旗袍的抵制加上中国女性着装开放程度的落后,导致了1926~1927年旗袍的出现频率低于旗袍马甲、文明新装;②北伐战争,孙传芳败局日显,导致他无暇顾及上海风尚,使人们对于旗袍的热情有所趋

缓。但是反常地出现了“亚当夏娃”效应,在官方明令禁止的情况下,《良友》画报并未停止对旗袍的宣传,当时地文献中孙传芳的禁令仅停留于道德层面,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这也就导致了《良友》画报通过设置新装介绍、海上新装的专栏来引领时尚,试图培养旗袍的流行群体。

梁文倩认为,旗袍在领部的设计上,元宝领出现的频率居多。元宝领斜切过两腮,从视觉上营造出瓜子脸的效果,符合当时人们追求纤瘦、羞涩的审美观念。在袖部出现频率最高的则为倒大袖,《流行大袖之推测》一文曾指出,倒大袖是出于对生活的便利性与对古人的模仿两方面原因。但此时倒大袖与相对紧窄的旗袍衣身形成静与动的对比,完整的构建了“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理想形象。

梁文倩对旗袍的配伍进行统计,发现以短发、簪花、裘皮大衣三者出现频率最高。对于剪发当时进步人士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的口号,并试图将其与禁缠足、兴女学一起作为女性解放的重要举措。但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时代女子剪发谈何容易,最终著名影星黎明暉在其出演的电影《花好月圆》中以短发形象示人惊艳绝伦,引发时髦女性的纷纷效仿,最终短发得以快速流行。簪花在此阶段由原先装饰在发髻上的饰品转移到领部与旗袍配伍。这与中国敬物尚简的传统有关,且能帮助佩戴者在一定程度避免了过于激进的视觉效果,营造出刚柔并济的美感。裘皮大衣的流行是由于民国时期封建的服装等级制度彻底瓦解,服装发展的掌控权转移到了财富拥有者手中,他们自然对先前不能触碰的服装形制而跃跃欲试,加之俄罗斯风格的传入,时尚的追寻者自然难以抵抗裘皮大衣带来的诱惑。

1926~1929的旗袍虽不如30年代的旗袍那样大放异彩,但其在款式、领部、袖部以及配伍等方面诸多“妥协”,造就了后续旗袍黄金年代的形成。通过一个个在服装表像上的变化而辅助女性更加积极地思考自我的解放。

(责任编辑:李强)